

“辛弃疾生擒张安国”事件释疑

——兼与王兆鹏先生商榷

符继成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 生擒义军叛徒张安国为南宋词人辛弃疾生平的重大事件, 但相关史料的记载颇有出入, 有的将之记于王世隆名下。现当代的学者虽大多以辛弃疾为此事的“首功”“主角”, 但或未详述理由, 或者解释勉强。近期, 王兆鹏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重回历史现场——辛弃疾生擒张安国始末考释》一文, 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具体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考证分析, 但该文观点及论证仍有可商榷之处。综合各方史料, 擒叛骑兵队名义上的领导者应为王世隆, 辛弃疾为谋士和随从的身份, 扮演着队伍“大脑”的角色, 其智谋为此次行动的成败关键。《魏胜传》中言张安国被擒的地点为济州以及对相关过程的描述具有合理性, 不宜完全否定。

关键词: 辛弃疾; 张安国; 词人; 历史

中图分类号: K8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5-0215-06

在南宋伟大词人辛弃疾生平中, 生擒义军叛徒张安国是一桩非常著名但又疑云重重的英雄壮举。宋人洪迈的《稼轩记》、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谢枋得的《祭辛稼轩先生墓记》及元人所编的《宋史·辛弃疾传》中, 均言此事系稼轩所为, 或与李宝将王世隆等人并力所为; 而南宋史官章颖的《魏胜传》及元人所编的《宋史·高宗本纪》, 则将此事系于王世隆名下, 只字不提辛弃疾的作用。面对互相抵牾的史料记载, 现当代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解释。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认为,《魏胜传》所述虽“必有所本”, 但“王世隆、马全福俱为自海州随同稼轩驰赴张安国军营之人, 诸人并力将张安国执缚, 其首功则稼轩也”^{[1](137)}。不过, 他没有详细说明如此论断的原因。辛弃疾研究专家辛更儒先生亦作如是主张, 并且推测《魏胜传》及《宋史·高宗本纪》中所载“必系王世隆冒领首功所致”, 但未为此论提供有力的史料依据^{[2](28-29)}。2013年, 王兆鹏先生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重回历史现场——辛弃疾生擒张安国始末考释》一文^①, 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具体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与分析, 使“历史现场”的真面目渐趋清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史料终究有限, 王先生所论似亦间有疏失, 仍未能完全解决这一历史疑案。因此, 笔者在王先生文章的基础上, 再加补充与考辨, 尝试还原另一种可能存在的“历史现场”。

一、辛弃疾在擒张安国行动中的具体角色

辛弃疾在生擒张安国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为什么有的史料会将此功记在王世隆名下? 这两个问题, 是还原这一事件的历史现场时首先要回答的。在《重回历史现场》一文中, 王兆鹏先生赞同邓广铭先生的看法, 力主辛弃疾为这幕“绝世惊险传奇剧”的主角, 但所持的态度更为审慎: 一方面, 他根据张浚都督建康府事在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 而擒张安国事在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闰二月这一史实, 认定章颖《魏胜传》谓张浚开督府后派遣王世隆擒张安国事不实; 另一方面, 他又在注释中指出: “虽然证实了张浚不可能指派王世隆, 但还没有充分的史料否定章颖所载王世隆擒杀张安国的完整记述和《宋史·高宗纪》的‘王世隆攻破张安国, 执之以献’的记载。在生擒张安国过程中, 辛弃疾和王世隆究竟各自发挥着什么作用, 尚待考证。”并且, 他还在正文中尝试对《宋史·高宗纪》中的说法加以解释:

我的理解是: 辛弃疾从建康返回海州后, 已没有隶属关系, 他生擒张安国, 没有上司指派, 纯属“个人”行为。当然也就没什么“组织”为他报功请赏。

收稿日期: 2015-06-25; 修回日期: 2015-09-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宋词编年史》(13YJC751010);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词体的唐宋之辨研究”(15BZW091)

作者简介: 符继成(1973-), 男, 湖南泸溪人, 文学博士,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唐宋文学与文化

而王世隆是受京东招讨使李宝的指派,从海州出发护卫贾瑞、辛弃疾至山东见耿京,传达朝廷的任命。耿京被杀,王世隆等于没有完成使命折返。他回后必然要向李宝汇报此行的经过和结果。又因为王世隆也应辛弃疾之请参与了生擒张安国的行动,李宝得知经过后,应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向朝廷为王世隆请功。故而《宋史·高宗纪》据相关官方档案资料,将擒获张安国之功记在王世隆名下。

王先生的审慎体现了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但其说仍有可议之处。

首先,虽然从时间上来说,《魏胜传》谓擒张安国事为张浚开督府于建康后所指派确实有误,但在“没有充分的史料否定”其他相关记载的情况下,就因此将其基本弃置不用,似嫌过苛。作为南宋史官所修的当朝国史,《魏胜传》尽管不可能完全准确,但也不至于信笔涂鸦,毫无依据。即以此事而论,虽然张浚开督府是在隆兴元年(1163)正月,但他于绍兴三十一年(1160)十一月已受命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3](3257)},三十二年(1162)四月兼节制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屯驻军马,全面措置两淮事务,此时王世隆事实上已经成为他的部属,招集北方义军之事也是由他在推动^②。由于生擒张安国一事发生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闰二月,时间很接近,而张浚和王世隆及北方义军在从属关系、工作职责方面也有瓜葛,再加上张浚当时在朝野的声望如日中天等因素,史官把此事说成由其所指派,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致误,均属情有可原。而且,史料记载中时间有误而事实可以成立的情况并非鲜见,如《宋史·辛弃疾传》云耿京起兵在金主完颜亮死后,时间亦“非是”^{[1](133)},但仍被王先生等众多学者列为辛弃疾擒叛一事的重要依据。因此,对《魏胜传》似不应执行双重标准。

其次,王先生对《宋史·高宗纪》中所记的理解,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第一,辛弃疾既已获南宋朝廷授官,就是有“组织”的人了,南宋朝廷会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管理、接待这一类的“归正人”。辛弃疾既有如此壮举,这些部门自亦能为其报功请赏。第二,根据《稼轩记》中“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用是简深知”的记载,可知辛弃疾已因此事见到了高宗并获得了赞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首功确属稼轩,那么李宝即使敢单独为王世隆请功并夸大其作用,“相关官方档案资料”又怎么会依样葫芦而不及稼轩呢?第三,尤其令人疑惑的,还是《魏胜传》中的记载。假如说,《宋史·高宗本纪》为元人所作,有可能因依据了“相关官方档案资料”而致误,那么《魏胜传》的作者章颖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章颖与辛弃

疾的生活时代相同,辛弃疾生擒张安国的壮举既然哄传朝野,并因此获得了高宗的召见,那么作为南宋朝廷的史官,章颖也应该是知情人,至少可以接触到知情人。而且,《魏胜传》系其于开禧二年(1206)奏进^{[4](548)},是年辛弃疾六十七岁,虽在铅山家居,但朝廷正有意重用^③,王世隆则早已于隆兴二年(1164)因有人告其谋叛而被斩^④。章颖如果知晓其事系辛弃疾首功,那么即使有李宝为王世隆报功请赏的官方档案资料,他也不应张冠李戴,据此把功劳完全归到一个谋叛之人的名下。

由此来看,对于辛弃疾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我们不能简单地冠以“首功”“主角”了之,还需做进一步的分析。综合各种史料,笔者认为存在着下面一种可能,即:这支擒叛队伍在名义上确实是由王世隆领导的,但行动的“大脑”是辛弃疾,也就是说,他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智囊、谋士,是此次行动的“主谋”。理由主要有三点。

其一,王世隆具备领导这支骑兵小队的资格、能力、人脉。王世隆本为山东豪杰,隶耿京下为马军将。绍兴三十一年九月,与赵开等人合攻成阳军(密州莒县),失败后率其马军驻于日照县。十月,李宝率舟师来海州,招降王世隆,令作山后都统制,并携其赴行在。其时,王世隆的马军尚有七八百留在海州。^①与之相比,辛弃疾加入义军的时间“应在绍兴三十一年十月间”,担任的掌书记属文职,相当于“耿京的秘书和参谋”,在奉表南归的一行人中也只是个“随从的角色”^⑤,无论是资历、职位还是率领骑兵作战的经验,都远不及王世隆。尤其重要的是,王世隆在海州还有相当数量的原义军骑兵部属可供调遣,这些原义军骑兵很可能是擒叛小队成员的主要来源。因此,由王世隆担任这支队伍的领头人应在情理之中,而辛弃疾之所以要“约”王世隆,也很可能与此有关。

其二,从辛弃疾的素质、表现与相关记载来看,将他在此次行动中的主要角色定位为谋士也比较合适。辛弃疾生平尽管智勇兼备,且“力能杀人”^{[5](12161)},有斩杀义军叛徒义端和尚之举,但最引人注目、最为人所称道的,仍为智谋而非勇力。他向耿京所献的南归之策,向张浚所献的分兵攻金之计,向南宋朝廷奏进的《美芹十论》《九议》及诸多论事札子,还有治理滁州、诱杀茶商军首领赖文政、建飞虎军等诸种行事,无一不体现了其过人的智谋和眼光。另外,陆游曾在《上二府论事札子》中提及张安国事,应该了解此事始末,但他晚年在《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诗中称勉辛弃疾为“管仲萧何实流亚”^{[6](1384)},所赞的也主要是他的智略。而且,《宋史·辛弃疾传》记其在海州得知耿

京被张安国所杀的消息后，“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6](12162)}辛弃疾与众人所“谋”的，当然不会仅仅是这么一句感慨的话，应该另外还有一整套具体的擒叛方案。由此可见，他在行动中确实起到了组织发动、出谋划策的作用，但因资历、地位、实力等均不及王世隆，所以他的身份很可能还是一个随从。

最后，将擒张安国事件的领导者与主谋者分属两人的定位，可以较好地解释史料记载中的分歧。假如这支擒叛骑兵队的领导者是王世隆，组成人员也主要来自他的部属的话，那么无论从制度来说，还是就情理而言，请功报告、官方档案及某些传闻将功劳记在王世隆名下都是可以理解的。章颖《魏胜传》中的相关记载或许便是根据这些记录，再杂以某些虚虚实实的传闻写成。《宋史·高宗纪》也有理由据此直书“王世隆攻破张安国，执之以献”。但是，此行敌我力量悬殊，要完成任务，只能智取，不能强攻。而智谋一道正是辛氏所掌，他承担的职责，实为此行成败的关键，加之他也亲自参与了抓捕行动，所以洪迈、朱熹等友人颂扬其功，突出其作用，《宋史》亦于其本传中书之。

二、生擒张安国的过程

生擒张安国的具体过程，是这幕大戏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但相关记载亦有出入。洪迈《稼轩记》中言此事系辛弃疾“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兔，束马衔枚，间关西秦淮，至通昼夜不粒食”^{[7](4)}；《宋史·辛弃疾传》则记为辛弃疾在海州与众人谋划之后，“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5](12162)}而《魏胜传》的记载是：

其后张浚开督府，尝问孰能为我生致安国者，王世隆应募愿往。浚命以五百骑与之，世隆辞焉，止以所部二十骑往。时安国已受伪命知济州，世隆以一骑至济州，谒入。安国骇曰：“世隆已南归，胡为至此？”使其人出视之，曰：“貌瘠而赤须也。”果然。出见之，世隆拔刀劫之上马出郊议事，庭下莫敢动。且曰：“王师十万至矣。”及交所随骑，每四五里则置一二骑，尽二十骑而驱安国并马而南矣。^{[8](第四卷 6-7)}

要还原生擒张安国经过的历史现场，能依靠的主要便是上述史料。那么，究竟该如何取舍？在这方面，邓广铭的《辛弃疾传》、王延梯的《辛弃疾评传》、辛更儒的《辛弃疾研究》等著作是三者兼用：擒拿的地点都定为济州，不过邓著仅言济州有驻军，未强调是

在“五万众”或“金营”中^{[1](23)}，王著明言为“有五万金军守卫的兵营”^{[9](22)}，辛著的说法是“张安国大营”，而“五万人”为其“所裹胁的部众”^{[2](26-27)}；至于抓捕过程中的具体细节，也基本上是三种史料的综合，不过采用的程度各不相同而已。

王兆鹏先生的《重回历史现场》一文在还原这段经过时，与上述诸先生均有所不同。出于审慎，他在正文中只采用了《稼轩记》和《宋史·辛弃疾传》中的说法，而将《魏胜传》中所述细节基本弃置，甚至对立起来。因此，擒拿张安国的地点仅被确定为“五万之众的金兵军营中”，而这“金兵军营”的地理位置则未说明；擒拿的过程，则据《稼轩记》和《宋史·辛弃疾传》中所述展开。不过，王先生也意识到：“凭借五十骑兵要在五万之众的金兵军营中赤手生擒张安国，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稼轩记》和《宋史·辛弃疾传》对这一过程的记述比较简略，为了增加其合理性，王先生先是特别强调了辛弃疾的军事才能，认为“英雄就是善于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辛弃疾是真正善于用兵的军事天才，“能打贏‘不可胜’之仗，把‘不可胜’变成‘必胜’”。然后，又引述了辛弃疾《美芹十论》《九议》中所论的战略战术，再进一步推论：“辛弃疾一定会经过侦察，对金兵营帐内的虚实和张安国的活动规律了如指掌，然后谋划制订出缜密的智取方案(决不会‘搏力’强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遂一举而成。”

笔者认为，王先生所论，“谋划制订出缜密的智取方案(决不会‘搏力’强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遂一举而成”这个推断可以成立，但正因为必须要“智取”，使人不免心生疑虑：人力有时而穷，即便是军事天才，在极端的劣势下，亦难有“必胜”之策。那么，以五十对五万，辛弃疾到底有何种“智取”方案，能够使他做到“必胜”呢？试想，当时宋金议和未定，小规模战事时有发生，作为一个有五万金兵的大营，必然是营帐多、占地广、戒备严，辛弃疾人马不多，时间有限，如何通过迅速的侦察，“对金兵营帐内的虚实和张安国的活动规律了如指掌”，然后发动突袭，精确抓捕呢？在五万金兵的军营中，放马跑个来回都要一段时间，金将就算“追之不及”，他传讯让人进行拦截的手段总是有的，辛弃疾等人又如何能随意出入，于事成后全身而退呢？在这种情况下，辛弃疾就算是盖世英雄，只怕也很难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那么，应该如何解开这个谜局？笔者以为，恰恰是王先生弃而不用的《魏胜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答案。

首先，从地点来看，《魏胜传》中言张安国杀害耿

京后“受伪命知济州”，这件事在没有其他反证材料的情况下，应予采信。张安国杀了耿京的消息传到海州后，辛弃疾、王世隆等立即赶来擒拿叛徒，这中间的时间不会太长。据《宋史·高宗纪》，耿京被杀和张安国被擒两件事情均发生在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不知道会有人来复仇，张安国自然不可能去很远的地方。他此时的位置，要么在义军原来的大本营东平府，要么在相邻的州县。而济州正与东平府相邻，所以张安国在杀害耿京后，便领了知济州这样一个“重赏”去寻欢作乐，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如无反证，即当存之。

其次，从过程来看，《魏胜传》中所记正好符合“智取”的要求并且成功的机率较高。济州治所虽然也会有驻守的金兵和张安国的部属^⑥，但较之军营，戒备必然较为松懈，抓捕的难度会小很多；张安国在治所的府邸是固定的，这样的话目标明确，容易定位，侦察起来也比较容易；单身入城，利用旧谊接近，则可以情动人，攻其不备；突起发难，劫持人质脱身，这是以寡敌众的上策，有胆有勇即可执行；声言有大军将至并安排接应，这是虚张声势，故布疑阵，有利于摆脱追兵。这一过程，固然“远没有辛弃疾在数万金兵驻扎的营帐里生擒张安国那样惊心动魄、令人震撼”，但同样需要“超人的智慧、胆识和身手”^⑦。并且，历史并非文学创作，不是越“惊心动魄、令人震撼”就越真实，而是相反，在史料记载有出入的情况下，越符合常理，可信度就越高。因此我们在“还原历史的现场”时，不必要也不应该拒绝这些相对普通的“历史的碎片”。

最后，从内容来看，《魏胜传》和《稼轩记》《宋史·辛弃疾传》的相关记载大体上是可以兼容的。知晓张安国在济州，故可以“径趋”；当地既有驻军和张安国的部众，则亦可笼统地称之为“金营”；当王世隆谒入时，张安国在府邸中的作为虽不得而知，但推测其正与金将“酣饮”，也说得过去；劫之上马时“庭下莫敢动”以及宣称“王师十万至矣”的表现，说明当时正处于“众中”；至于其后的南归方式，则均为纵马疾驰，自不待言。需要多说几句的，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辛弃疾在济州实施抓捕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据《魏胜传》，则入城诱张安国出见并“劫之上马出郊议事”的仅王世隆一人，辛弃疾如果随行，应该是在城外的接应者中；而据《稼轩记》和《宋史·辛弃疾传》，似乎又是辛弃疾亲自动手缚了张安国。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王世隆将张安国带到城外后，由辛弃疾亲手于众中缚之并挟于马上南归；二是王世隆和辛弃疾这一主一随的二人组合一起去了济州城

中。由于王世隆进入耿京义军较辛弃疾早，与张安国的交情可能比较深，再加之他归宋的时间也较早，张安国对他的情况不大了解，有好奇心，故而负责诱敌的是他。张安国出来后，或者由辛弃疾在旁发动突袭，或者两人共同动手，将张安国缚执马上出城。章颖说王世隆“以一骑至济州，谒入”，可能是因为传闻之误，也可能是当时的相关记录或请功报告为了突出王世隆这个“主”而做了处理。

第二个问题，是《稼轩记》中所言的“五万众”如何解释。关于这一点，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驻守济州的金兵和张安国的部众加起来确有五万人；二是当地实际没有五万驻军，不过是号称而已（这在史料中经常可见）；三是《稼轩记》本非严谨的史记，文学色彩极强，所谓“五万”，或是大略而言，或有夸张的成分。

总之，笔者认为，在还原生擒张安国的过程时，《魏胜传》仍是一份不可忽视的史料，其中的细节既体现了擒叛者“超人的智慧、胆识和身手”，又具备较强的现实合理性，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与《稼轩记》《宋史·辛弃疾传》等相关记载加以融合，构建一个可信可感、有据可查的历史现场，而不必通过想象去补充关键情节。

三、张安国杀耿京的时间

张安国杀耿京的时间，前文已述及，在《宋史·高宗本纪》中，与张安国被擒一事并系于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不过，王兆鹏先生认为这条记载并不确切：“事实上，从张安国杀害耿京到辛弃疾生擒张安国，其间相距时间甚长。我的推测是：张安国杀耿京在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间贾瑞、辛弃疾等南下之后，故至绍兴三十二年正月月底辛弃疾北返至海州时已获悉耿京被害。”据王先生的推测，则张安国杀耿京的时间为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间至绍兴三十二年正月月底。然而，这个推测颇可商榷。

首先，所定时间的上限不对。贾瑞、辛弃疾等人奉表南归的时间，是在完颜亮被杀、金廷政局稳定之后。据《铅山辛氏宗谱》中的《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稼轩历仕始末》，为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1](283)}。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一行人至建康，为宋高宗召见^{[10](1787)}。正月二十二日，制授义军耿京以下诸人官职^{[3](3312)}。据陆游《上二府论事札子》：“张安国所犯，在己受旗榜招安之后。”^{[6](1996)}则张安国杀耿京的时间上限，应在南宋朝廷正式发出授予耿京等人官职的制

令之后，亦即绍兴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之后。

其次，将绍兴三十二年正月月底定为辛弃疾北返至海州的时间亦不妥。从建康至海州，有一千多里的路程，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在并非军情急务的情况下，辛弃疾等人与枢密院所差的使臣即使在正月二十二日制令发出之后马上出发，要在月底到达海州，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试参考以下事例。

第一，据《宋史·吴玠传》，绍兴三年，金兵侵饶风关，吴玠自河池日夜驰三百里至饶风救援，金将撒离喝大惊，以杖击地，感叹“尔来何速耶！”^{[5](11411)}由此可知，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骑兵一日夜三百里的速度已经是很令人惊讶了。辛弃疾与枢密院使臣等一行人中，有的是文臣，持官告节钺去北方亦非紧急事务，因此他们自然不会日夜兼程赶路，速度也不会很快，每天百里左右应属正常，更何况，到楚州时还出现了使臣“革、彪不敢行”的耽误呢！据此推论，他们从建康到海州最起码也得十天以上的时间，即进入绍兴三十二年二月份了。

第二，据《三朝北盟会编》，辛弃疾等人于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从东平府奉表南归，到达建康的时间是正月十八日^{[10](1787)}。即使按十二月下旬出发计算，他们在路上所费的时间也有二十多天，而海州大致处于这段行程的中间位置，因此他们回程至海州所花的时间也应在十天以上。

第三，绍兴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接伴使洪迈等从建康出发，赴淮河边境将过来报告金世宗即位消息的金使高忠建接到临安，一去一来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大约是建康至海州的 2.5 倍^⑧，路上共花了 73 天时间^⑨。如果两队人马的速度相差不大的话，那么辛弃疾一行需 20 至 30 天的时间方能抵达海州。

由此可见，辛弃疾等人北返抵达海州的时间为绍兴三十二年二月份以后，这个判断应该合乎事实。

据以上所述，则张安国杀耿京的时间，是在绍兴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之后，辛弃疾等人返回至海州之前，具体时间尚难明确。不过，下面两条未引起王先生足够重视的史料，为解决这个问题又提供了进一步的帮助：

始，京东义士耿京率众据东平府，遣掌书记辛弃疾赴行在。壬午春，勅授京天平军节度使、节制京东河北忠义军。既而高忠建来告登位，朝廷遂不复通。后京亦为虜所诛。^{[2](462)}

(大定二年，绍兴三十二年)二月，遣使高忠建往宋告嗣位。……是时，京东义士耿京率众据东平府，遣掌书记辛弃疾南附于宋，授天平节度，节制京东河北忠义军马。既而遣使往南宋通和，遂不复通，京遂

为国中所杀。^{[11](222-224)}

这两条史料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把耿京被杀的时间定于金使高忠建来南宋报告金世宗即位与通和意图之后。金使抵达临安的时间虽在绍兴三十二年三月，但宋高宗初次得知金使要来的消息是在绍兴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即下达了耿京等人的封官制令后一天。是日，宰执报告金使将于二月渡淮，一贯主和的高宗立即跃跃欲试。二十五日，他对宰执表明态度：“朕料此事终归于和。”^{[3](3313-3314)}此后，他关心的重点便转到了如何议和上来。

在这种主和的背景下，南宋朝廷对招纳耿京等北方义军的态度必然会转为消极。尽管耿京等人的封官制令已出，但各种迁延是免不了的，他们回程的时间很可能远远超过了正常时间。由于信息沟通不畅，本就缺乏组织纪律性的北方义军难以抵挡金人的威逼利诱，于是便在等待的过程中出现了军心涣散、士兵溃逃乃至杀害主帅的现象。对此，章颖的《魏胜传》中说得清清楚楚：

时葛王雍已立，大赦曰：“在山者为盗贼，下山者为良民。”中原忠义所在保聚以待，而往来议和使命相踵于道。中原之民，乃乘赦宥，归保田里，故张安国贪虜重赏杀京。^{[8](第四卷6)}

这条记载，可作为上面两条史料中“既而高忠建来告登位，朝廷遂不复通。后京亦为金所诛”以及“既而遣使往南宋通和，遂不复通，京遂为其将张安国杀之以来降”这两句话的解释与佐证，而张安国杀耿京的时间，也可确定在绍兴三十二年二月金使渡淮之后。

这个“之后”的时间，还可更具体一些。《宋史·高宗本纪》系此事于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王先生认为不确，但这个记载其实从情理上完全可以成立：在绍兴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制令颁布后，贾瑞、辛弃疾等人由于要处理各种手续，接触各方人物，会合枢密院使臣及王世隆等共赴北方的人马，再加之路上的耽搁等各种因素，于这一年的闰二月方返回至海州。此时，“保聚以待”的耿京义军早已因为宋金议和而人心惶惶，军心动摇，贾、辛等人确切消息的久候不至更加剧了这种趋势，于是，张安国等便在金人重赏的诱惑下乘机杀了耿京。消息传到海州后，一场擒叛复仇的传奇剧就此开始上演。因此，在没有其他明确记载的情况下，《宋史·高宗本纪》中的说法不宜轻易否定。

综上所述，“生擒张安国”事件的始末是：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张安国杀耿京，随后领了知济州的“重赏”。奉表南归后还至海州的辛弃疾闻讯，以谋士、随从的身份，发起了擒叛的动议，制订了可行的方案，找来了合适的执行者，并且亲身犯险，与众人共赴济

州生擒了张安国,然后“束马衔枚,间关西秦淮”,将俘虏送到了临安。事成之后,他如《瑞鹧鸪·京口病中起登连沧观偶成》词中所言:“声名少日畏人知”^[12](571)],无意与人争功,甘心当起了“幕后英雄”。在这个可能的历史现场中,辛弃疾的“戏份”,仍然极其光辉夺目,仍是这幕“惊险传奇剧”中当之无愧的主角。而王世隆尽管身为领导者,在“剧”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将功劳记在他名下也有理有据,但终究还只是一个配角。

注释:

- ① 载《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本文中所引的王兆鹏先生的相关论述均出自此文。
- ② 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九,第3357页,第3376页;杨万里《张魏公传》,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416页;《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307页。
- ③ 参见章颖《魏胜传》,《宋朝南渡十将传》,芋园丛书本,南海黄氏1935年汇印,第四卷第7页;《宋会要辑稿·兵》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 ④ 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0—1701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三,第3230—3231页,卷一九四,第3278页。
- ⑤ 王先生认为:“从张安国杀害耿京到辛弃疾生擒张安国,其间相距时间甚长。”此说亦可商榷,详见下文。
- ⑥ 王先生在文中谓济州“无金兵驻守”,此论无史料支持,恐难成立。耿京被杀前据守东平府,声势相当浩大,金军不可能不

在周围州县驻守。辛弃疾等人如果真是赴济州去擒张安国的话,此时耿京刚死不久,二十余万义军即便完全星散,地方一时也不会平靖,因此当地驻军应该还是有的,只不过数量多少成疑,也未必全在济州治所而已,更何况,张安国也必然保留有自己的部属。

- ⑦ 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测算所得,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 ⑧ 出发日期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六,第3315页;到达日期为三月十一日,见同书卷一九八,第3344页。

参考文献:

- [1] 邓广铭. 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 [2] 辛更儒. 辛弃疾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3]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4] 纪昀, 等. 南渡十将传·提要[C]//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5] 脱脱, 等.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6] 陆游. 陆游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7] 邓广铭. 辛稼轩年谱“开禧二年”条下[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261-265.
- [8] 洪迈. 稼轩记[C]// 辛弃疾资料汇编, 辛更儒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9] 章颖. 宋朝南渡十将传·魏胜传[M]. 南海黄氏, 1935.
- [10] 王延梯. 辛弃疾评传[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 [11]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2] 李心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A discussion on the event of Xin Qi-ji capturing Zhang An-guo

FU Jic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Capturing Zhang An-guo, the traitor to the uprising troops, was a famous event in Xin Qi-ji's life experiences.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records about this event in history, some of which gave the chief credit to Wang Shi-long. Although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scholars mostly believed that Xin Qi-ji was the hero, they did not give an adequate explanation. Recently, Mr. Wang Zhao-peng expounded his views on this topic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Literature Review*, but the question is still open to discussion. Considering all the historical data, the nominal leader of cavalry organized for capturing the traitor should be Wang Shi-long, while Xin Qi-ji, as a counselor and attendant, was the brain of the team, whose wisdom was the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event succeeded or failed. *The Biography of Wei Sheng* recorded the capturing of Zhang An-guo in Ji Zhou and some relative descriptions, which is rational and should not be completely negative.

Key Words: Xin Qi-ji; Zhang An-guo; *ci* poet; history

[编辑: 胡兴华]